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大学军事教育

朱蓉蓉¹, 李 飞²

(1.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2.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 为克服抗战前军事教育成效不彰的弊端, 国民政府利用抗战初期战区高校内迁和教育政策调整之机, 进行大学军事教育改革, 通过严格军事教官的遴选与管理、增设军事教育课程、完善军事教育内容等方式, 加大大学军事教育的实施力度。战时国民政府大学军事教育的开展, 巩固了学生的精神国防, 激发了大学生从军报国的热潮, 推动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开展, 同时也打破了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文武殊途观念, 促进了抗战新局面的到来。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 大学军事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5)08-0085-07

The University Military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ZHU Rong-rong¹, LI Fei²

(1.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nefficiency of military education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ade use of the removal of universities and adjust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to reform military education. To promote military educat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ok such several measures as setting strict demands for the selection of military officers, establishing new military courses, and improving the contents of military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 military education strengthened the spirit of national defense among students, inspired them to join the army, and brok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that the pen and the sword were reaching the different goals, which brought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War.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university military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5-04-26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LSB006)

作者简介: 朱蓉蓉(1968—), 女, 江苏靖江人,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李 飞(1984—), 男, 安徽宿州人,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社会各界对大学^①军事教育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有鉴于此,国民政府适时调整教育政策,对大学军事教育进行改革,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迄今学界对抗战时期军事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推行的童子军教育和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对这一时期大学军事教育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大学军事教育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先进。

一、抗战时期大学军事教育改革缘起

我国学校的军事教育虽发轫于清末民初,但往往缺乏整体规划,时兴时废。及至1928年日本在山东制造“五三惨案”,国人为之愤疾,此时恰逢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大会遂一致通过《中等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学校军事教育由此正式开始实施,大学军事教育也迈向“有目标、有计划、有制度、有内容的境地”。^[1]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虽对大学军事教育非常重视,不断制定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完成专科以上受训学生约93177人^[2],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说来成效不彰。

1. 抗战前国民政府在大学中推行的军事教育成效不彰,军事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一方面,军训设备匮乏,训练方式呆板,有纸上谈兵之弊。“各级学校军训设备,其缺乏之程度,几难令人置信。”^[3]在大学军事训练中,最低限度的器材配备都不能齐全。不仅军事图标、模型等很少看到,学校所用的枪支居然“有的是木枪,有的是光绪二十年的枪,有的是宣统三年的枪,……其他如轻机关枪,防毒器具等教材,那真是绝无仅有了”。^[4]虽说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在1934年12月修订了《全国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设备最低标准表》,要求大学应配置11大类52种军训设备^[5],并规定了最低配置数量,但许多学校因经费支绌,未能遵照规定购置,以致军训课目无法全部实施。

训练器材严重缺乏,导致训练方式也很单一,枯燥的制式训练,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反感。“他们始终在制式教练中度着时光,从头到脚,把生活固定在操场上,无限制的重复着,立正、稍息、左右转弯”^[6],学生们认为“受了几年训练,没有做过一次实弹射击,这种训练,就连续十年也毫无用处”^[7]。制式训练虽是军训的基础,有利于学生纪律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养成,但只进行单纯的制式训练,其效果必然有限,受训学生的消极抵制情绪也日渐滋生。“一般学

生对于军训,都以为当道弄的表面文章,没有实际的意义和具体的价值,即使真的大战临头,也不会真让他们去上火线,他们的上操是为着得文凭。”^[8]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无怪许多青年对于军训感觉到苦闷了”。^[9]

平时军训如此,每年由训练总监部在暑假组织的集中军训也是名负其实。大多数人认为,当局很多时候是抱着纠正青年“偏激思想”的目的来办理军事训练的。蒋介石曾电令训练总监部加紧实施高中以上学校的军事训练,要求“操作时间务须增多,课余之暇,关于文课及军事必要课程亦宜酌量添授,使莘莘学子专心本业,增益军学,不可专心游行宣传,徒托空言,不务实际,以学术救国为正鹄”^[10]。由此看来,主训机关只是以集中军训为幌子,在学生中行党化教育之实。这样的集训,只是形式上的“一年一度的举行下去,只是使政府多消耗金钱,学生们荒废学业罢了”。^[11]

另一方面,军训教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未能满足一般对军训之期望”。^[12]虽然训练总监部自1929年起就实行了教官考选制度,注重对教官的选拔,但“今日各校军事教官,具有丰富学识和高尚人格者固不乏人,然基本知识不足和修养欠缺者亦所在多有”^[13]。在管理方面,教官也未能因地、因人制宜。军训的教官虽都曾经在军队生活过,但军队生活与学校生活差异很大。学校是一个充满自由的地方,受教者是一群自由散漫的学生,对于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教官来说,初到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空气的学校,“一切都看不惯,操切一点的,便大刀阔斧的硬干强干,引起各方面的反感与不快;稳健一点的,便只好随着环境敷衍,甚至慢慢的变成消极灰心。还有他们做事的方式多半是直线的,对人的态度多半是敷衍的,……对于其他学科的修养多半较差,管理学生多半采用军队中的硬性方式”^[14]。“开口命令,闭口服从,滥用权威,恣欲所为”,学生对教官“大都均无好感,乘机攻逐教官者,到处可闻,学生不守纪律之行为,就此养成,非但青年学生为之贻误,而抗战之前途,亦为之影响不少”^[15]。有的教官多顾惜学生们是“文”学生,不愿意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他们,致使学生“精神常呈散漫,而无结果可言”。^[16]甚至连蒋介石都觉得虽经过训练,但有的学生仍然“服装仪容甚不整齐,精神亦不振作”。^[17]此外,军训教官由训练总监部或政治部委派,职务任免与迁调与学校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的行为可以不受学校约束,由此在组织领导上产生不少问题。

综上,抗战前的大学军训由于训练经费、设备严

重不足以及教官综合素质偏低,导致军训流于形式,与学生要求切实地传授他日能为民族捐躯技能的目标相差甚远。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以前的军事教育进行检讨时也不得不承认:“过去学校与社会对于军训未能了解其意义。”^[18]大学军事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2. 抗战初期战区高校内迁和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整,为大学军事教育改革提供了客观条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常常有意识地对大学教育设施进行破坏,导致战区高校财产损失惨重。为确保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十年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致付诸东流,1937年8月中旬,教育部密令战区高校“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战区学校对于学生除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另有规定调遣服务者外,务应劝告其迁入内地,以备异日为国效用”。^[19]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临时大学。随着战势危急,又将迁至长沙各高校再次移至昆明,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改称西北联合大学,并迁移至陕甘地区。随着战区不断扩大,高校纷纷内迁。这些学校内迁之地域,“远者则深入内地,西北达陕甘,西南穷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昔日视为交通不便高等教育未发达地区,今皆成为学府之林”。^[20]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也形成了三个学校文化区:以白沙镇为中心的江津县;北碚、夏坝有复旦大学、国立江苏医学院;沙坪坝有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及一些艺术、工业专科学校。高校的集中,为军事教育改革的推行提供了便利。一方面后方相对安全,为军事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学生易于集中,可减少奔波之苦。此外,学校靠近军管区,军训资源也较为丰富。

抗战初期教育政策的调整为大学军事教育的推行提供了政策依据。为适应抗战需要,1937年教育部颁行《战时动员计划(草案)》,要求战时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其已成年而志愿参加作战者,应依军事机关之规定,在特定处所接受军事训练(或入战时服务训练班)。高中以上学校应一律加紧军事训练”。^[21]1937年8月11日,行政院核发《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各级学校之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22]9月19日,教育部与训练总监部共同制定《高中以上学校学生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提出“全国高中以上学校在战时除应继续实施正常教育外,应加紧实施业经教育部规定之

特种教育,预备从事后方服务,以协助军事推进,发挥国防教育之实效”^[23]。9月29日,教育部在《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中,重申了以上两个文件的内容。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定文武合一的教育方针,规定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须彻底加以整顿,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对于学校及社会体育应普遍设施,整理体育教材,使与军训童训取得连贯;强迫课外运动,以锻炼在学青年之体魄;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中等以上学校一律采军事管理方法,养成清洁、整齐、确实、敏捷之美德,劳动服务之习惯,与负责任守纪律之团体生活。^[24]可见,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对大学军事教育益加重视,并不断调整其教育政策,为大学军事教育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同年8月,蒋介石对现行教育制度提出严厉批评,教育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蒋说:“我们中国近几十年来倡行所谓‘新教育’,在表面上似乎是理论方法,应有尽有,实际上这种‘新教育’只是盲从、粉饰、凌乱、空泛、无计划、无目的的教育,……其结果,使我们国家民族到今天要受敌人无止境的侵略,蒙受现在这样奇重的耻辱!老实说一句,最近这二十七年来教育,几乎多是糊涂的教育,其影响所及,不仅足以亡国,而且将致灭种!”^[25]可见,蒋对于现行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是极度不满的。

二、抗战时期大学军事教育改进举措

战时教育政策的调整和领导人的批评,成为大学军事教育改革的助推器。随后,在军事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大学军事教育改革在国统区全面展开。

1. 严格军事教官的遴选和管理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及时调整了军事教育机构。1938年2月,学生军事教育工作由训练总监部改由新成立之政治部掌理,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1940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明确权责,增进绩效,又将学校军事教育改由军训部管理,统一规划学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教育部协助办理。

针对社会各界所诟病的军训教官问题,政治部设立专门机构对其进行训练。1939年5月,中央训练团军训教官训练班成立,班主任由政治部第二厅

厅长杜心如兼任,共计招考 300 余人,分为军训教官、体育干部、妇女教官三组^[26],招选人员分为学员队和学生队,“前者均系军事学校毕业服务二年以上正式军官,训练期间为八个月。后者系招考专科以上学校毕业青年,在教官班训练六个月后,又送军校受训,为期约共年余”^[27]。8 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训谕拟定《中央训练团三年调训计划》,对各省实施军训的人员和教育人员,各中等以上学校军训教官,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执掌训育人员进行集训。每年分五期,每期训练六周,三年内训练完毕。^[28]训练完成后,再分配到各学校实施军事训练。1940 年,政治部又组织教官学术研究会,研究改进训练方法。1941 年,军训部将各学校军训教官调至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助教于寒暑假由军管区司令部调训,并加以考核,对于“成绩低劣者即予淘汰或另行安置”。^[29]同时,在正式军官学校和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生中招考军训干部,经培训后派充高中以上学校军训教官和助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官的综合素质。

在管理上,严格教官在实施军训期间的考勤制度,规定学校中各级军事教官,除规定之例假外,暑假、寒假、春假概不放假,对于请假较多的军训人员给予相应处罚。“各级军训人员有事假病假连续逾两个以上者予以停职”,“事假病假请假日期截止考绩期结算,有事假逾一月以上者,病假逾二月以上者,应将超过日数于本年考绩服务分数内超过一日作一分扣除之”。^[30]

为提高教官的积极性,政治部又制定相关激励措施。一方面,为优秀教官提供深造机会。1938 年全国军训会议规定:“教官之有上进者,亦于部队同其待遇,而于服务久远者则可直接调入部队充当团旅长等。”^[31]1942 年 2 月,军事委员会为提高高中以上学校军训教官的工作效率,颁行《选调高中以上学校军训教官助教入学暂行办法》,规定对于学校军训教官和助教服务满两年,其学品与考核成绩优良者,由军训部保送参加军官留学员生考试,选调其参加兵科学校及其同等或以上学校受训;具有相当军事学校而非兵科毕业生,转由军训部选调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军官训练班受训。^[32]

另一方面,提升军训教官的薪资待遇。1942 年政治部规定“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官月支薪额为 100 至 120 元,每年以 12 个月计算”^[33]。同年,因物价上涨过快,军训部和教育部明令“高中以上学校军训教官助教亦应与各该省市学校教职员同等待遇,由校报领平价米或米贴”^[34]。

2. 增设军事教育课程

抗战爆发不久,教育部便积极推进大学课程改革,推行战时课程,明令战时各级学校教育机构“均应力求切合战时需要,各级学校之课程与管理应视实际情形,量予变更”。^[35]1938 年教育部订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今在学校,宜以军事教科列入课程中,……认军事知能为人生应具之智能”^[36]。1938 年 4 月,国民政府公布《抗战建国纲领》,系统地提出抗战救国的主张,要求各级教育机构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课程;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

1939 年 12 月,教育部又明令“各大学研究所研究军事上亟待解决之问题,专科以上学校注意战时教程,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及医药救护人材,并于必要时特设专修科,以应需要”^[37]。随后,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分析讨论会,整理大学课程。

1940 年,教育部拟定《教育计划与国防计划之联系方案大纲》,将大学各院系按照国防需要加以调整,专科以上学校减去次要课目,加授有关国防之教材,或尽量补充原有课目。大学各学院增设课目情况如下:

表 1 大学各学院增设课目表

学院	专业	增设课目
理学院	物理	气体动力学、弹道学、侦察摄影、无线电等
	化学	军事化学(毒气、病菌、炸药、防御毒气和病菌之材料等制造)
	地理	军事地理、战时地理、日本地理等
工学院	机械	航空工程、兵器学、战车舰船、潜艇、鱼雷、汽车等
	土木	桥梁、炮垒及一切防御工事之建筑、航空测量
	电工	军用电讯、电网之构成与使用、发电机、无线电收发机之制造与修理
医学院		战时救护、战时公共卫生、战时医院组织、军事看护
农学院		战时畜牧、救荒植物之利用、食物统制、军粮研究
商学院		战时消费统制、战时对外贸易统制、战时金融、货物与粮食运输、中国公债问题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教育 1),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第 124—126 页。

此次课程改革除表中所列五个学院外,还涉及

文科、法科、艺术科、师范科、体育科五科,增设课目达68种,理、工学院增加最多,占近半数。1943年,专科以上学校增设国防和战史讲座,选派受陆军大学教育之将校讲授。大学新添授的课程都与战时专业军事技能紧密结合,这些方案将学校军事教育视为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政府希望通过学校军事教育以加强国防实力的良苦用心。

3. 完善军事教育内容

首先,加强平时训练。1939年,政治部会同教育部对高中以上学校的军事训练方案进行修订,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其修业年限在三年以上者,第一二三年均实施平时训练,每周二小时,学术科各一小时,其修业年限仅二年者,各学年平均训练每周三小时,第一学年学科一小时术科二小时,第二学年学科二小时,术科一小时,每年野外演习至少四次,每次二小时以上,实弹射击四次”^[38]。在校学生每学年均须实施平时训练,改变了以前仅在一年级实施的情况,避免了军训一曝十寒之弊,使军训普及于全体学生并便于战时对学校进行军事化管理。

其次,集中训练突出实战。一方面重视集中训练,使其与学生毕业挂钩。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改善专科以上学校军事训练案》,规定“学生修业期满后,由政府予以六个月至一年之集中军训。集训完竣,由政府给予军训证书,与学校毕业文凭同发;学生未受集训者,不准就业,亦不给予毕业证书”^[39]。另一方面更加注重集训的实效。由于全国抗战形势日益严峻,集训指导方针突出实战,注重战术实施、战斗动作与土木作业,以应战时需要。在战时集训的选址上,以军队方式及有利战术实施为主旨,依地理形势(平原、山地、河川)为择地之目标。虽说实战训练使学生对各项基本军事概念有感性认识,并能获得实际之经验,但终因中央财政困难,经费支绌,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1942年后集中军训改由各省组织。

再次,注重军训督查。为确保学校军训的实际效果,抗战前训练总监部即制定相关章程检核军训实况,要求每年至少施行一次军事教育查阅。具体项目为:“学生心身之锻炼、纪律之涵养及服从负责耐劳诸观念;学校军事教育诸设备是否完善;学术科课目预定进度表是否实施;校长对于军事教育是否热心;学科务须洞悉娴熟具有运用能力为主,术科务求简单适用具有对敌精神为主。”^[40]抗战后依循前例并加以强化。1939年政治部规定,中央有关机关“应会同派员举行学校军训校阅及视察,每年至少一次;省(市)主管机关,应会同派员视察学校军训,每

学期至少一次;校阅或视察其成绩最优及最劣之学校当局与军训人员,由中央或省(市)主管机关,明令奖惩;定期举行全国或省(市)学校军训总检阅”^[41]。并预定于当年十月前完成与教育部会同各省军管区及教育厅视察川陕甘黔等省各校军事训练及管理业务;十二月完成抽查其余各省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1942年,军训部又强调高中以上学校每年元旦务必“普遍举行检阅”,检阅项目除以阅兵式和分列式为基础课目外,酌量增加射击竞赛,以收督导激励之效果。可见,学校军事教育的各种考核评估工作已系统化,促进了军事教育的发展。

此外,为提升学生对军训的兴趣,在学校设立军训奖学金。政治部在1940年决定,每年在集训经费中拨五万元创办“中正军训奖学金”,奖励在军训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受奖金额分甲类300元和乙类150元两种,“以引起多数学生竞求向上之心,藉收间接提倡军训之效”^[42]。

三、抗战时期大学军事教育的成效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学军事教育的改进和完善,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变化,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为全民族抗战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军事教育巩固了学生的精神国防,构筑了大学生的心理万里长城

何谓“精神国防”?“精神国防就是把一切年龄、职业、思想、生活不同的国民的意识、思维、智慧、道德等精神力量,集中在国防最高的目标之下,发挥其功能,提高其价值来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43]换言之,就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把一切颓废、散漫、苟安的精神生活方式加以改造,摒弃求和与妥协投降的心理,集中意志和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军事教育对于大学生而言,涤新了他们的陈旧意识,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够紧密地团结在抗战御辱的旗帜下,一致对外,挽救民族危机,从心理上铸就了一条万里长城。

抗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国土相继沦陷,造成了民众和军队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为渡过艰危时刻,国民政府先后开展了“精神胜于物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和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大学生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各运动的开展。1938年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会上,昆明的大学生举行歌咏晚会,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高呼“驱除日寇”、“抗战到底”的口号。汪精卫叛

变之后,武汉大学 3100 多名学生联名通电,一致声讨汪精卫的叛国行径。1940 年 3 月 1 日,西南联合大学 3000 名师生举办“国民动员月”活动,强调“一个意志很坚强的民族,绝不会失败”,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念、坚强的意志”。^[44]

军事教育使大学生“保持日新又新,永不屈服的精神”。^[45]各大学积极响应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如西北联合大学主动停止各种应酬,节衣缩食,取缔浪费,学校呈现出积极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1939 年 3 月,著名教育家胡庶华在全校纪念周大会上说:“物质方面我们诚然(有)不及敌人的地方,我们却把我们的精神发扬起来”,“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都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46]当时,大后方的大学生“无论来自何校,无论是学理工,还是学文法的,无论是流亡学生,还是本籍学生,大家只有一个义无反顾的目的:抗日”。^[47]

大力推进军事教育,使青年学生颓废浪漫的生活被严格的纪律化、合理化的生活所代替,使“每一个人烈火一般的热情,钢铁一般的力量”能够发挥到正确的途径上去,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1940 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但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群钢筋铁骨、生机盎然的男女青年,军训给每个人赶走了沉闷、颓唐与悲哀的心理”。^[48]

2. 军事教育激发了大学生从军报国的热潮,提升了部队素质,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动员作用

军事教育使“我们国家的青年,从观念上到生活行动上,接受战斗意志的熏陶”。^[49]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大学生积极从军,为军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华担任军事顾问的魏德迈指出,国民政府征来的兵“素质不佳,一般下级官员又缺少文化,不能掌握新式武器”。^[50]同时史迪威也向国民政府建议,征调大量知识青年空运印度,在短期内建立一支素质优于日军的部队。此时蒋介石基于争取盟国援助的考虑,遂予以采纳。

抗战期间,首先参加战时服务的是医药科系的学生,从 1939 年开始,他们一部分到军事后方医院服务,一部分到国家医疗卫生机关服务。1941 年起,“因赶造公路及加强兵工制造,又有大批工科学生被征参加。同年秋,美国空军来华,复征调外国语文系学生担任译员工作”。^[51]其后因美军人数增多,对译员的需求更为迫切,当时“渝、蓉、云、贵各大学

四年级学生已全部征调,人数高达 3600 人”。^[52]之后,每年又有许多土木科系的学生支援建筑工程、军事工程,法律系的学生充任军法人员。

在民族存亡之秋,大学生参加到神圣的抗战行列,不仅满足了军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同时也使大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前途凝为一体。

1944 年秋,日军长驱直入,大举进攻桂黔,重庆岌岌可危。8 月,蒋介石密令吴铁城、张治中“发动一党员团员从军运动,第一期人数以十万人为目标,期于三个月内征集之”。^[53]8 月 27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鼓励知识青年从军。10 月 11 至 14 日,国民党连续召开三次知识青年从军会议。24 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书》,掀起青年从军高潮,“各地学生纷纷自动请求从军,一校倡议,各校响应,转瞬之间,蔚成风气”。^[54]至 1945 年春,全国大学生应征入伍者逾十二万之众,除一部分拨驻印军及其他部队外,编成九个师。^[55]国民政府为此专门设立青年军训练总监部,统筹训练和分配。

学生从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众惧服兵役的心理,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中国社会向来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文武殊途,文人墨客以当兵为凶事、为贱役,重文轻武积习甚久。“七七事变”后,兵源亟需补充,虽然此前国民政府竭力宣传兵役法,但知识青年轻视当兵的心理仍然没有改变。“打了六年多的仗,兵源补充大多来自农村与城市贫苦民众,豪绅子弟与大中学生都在征募之外。”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起之后,大学生投笔从戎,以身作则,对于社会上重文轻武的心理是一个重大的刺激,他们“自动入伍,对于兵役平等原则的实施,将有极大的帮助”。^[56]在大学生从军运动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积极动员,党国要人、社会名流竞相送子参军,各级行政、业务机关的公务员也纷纷报名从军,一时社会人员从军成为一种风尚。

在爱国主义情感影响下,这些大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舍生忘死、各尽所能为战时服务,无疑为当时的抗战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抗战前后,我国教育尚未普及,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兵源多系来自农村,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政治意识,这种状况在大学生从军后得到了改善,无形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同时,这些学生还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当国防教育的教员,言传身教,对其他没有受过教育的社会成员施以影响,发挥其骨干

作用,为抗战新局面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适时地调整教育政策,对大学军事教育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全民族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国民政府在推行大学军事教育中渗透着党化教育色彩,控制学生的意图亦非常明显,军事教育过程中刚性军事管理和威权主义的实施,与五四运动以来在教育界盛行的民主自由的教育思想也是背道而驰的。

注释:

① 本文中的大学,指普通国民教育系列非军事类专科以上学校。

参考文献:

- [1] 卓文义. 抗战前我国的国民军事教育[J]. 近代中国, 1984,(42):147.
- [2][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2)[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1286,1272.
- [3][51]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K].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1333,13.
- [4] 李志正. 国难时期教育与军事训练[J]. 前途,1936,4(5):69.
- [5] 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 学校军训法规[Z]. 1937:36.
- [6][9] 宣侠父. 对于青年军训的一些意见[J]. 青年战线, 1938,(4):4,4.
- [7] 程天放. 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J]. 中华教育界, 1932,20(6):120.
- [8][16] 左震寰. 谈大学军训的过去与今后[J]. 文化与教育,1937,(123):5,5.
- [11] 宏范. 谈学生集中军训[J]. 人间十日,1937,(5):5.
- [12][29][41] 白崇禧. 学校军训问题[J]. 国民教育季刊,1941,(2/3):8,9,19.
- [13] 欧元怀. 学生军训问题[J]. 教与学,1939,3(12):9.
- [14] 龚宝善. 学校军训改进刍议[J]. 教与学,1940,5(4):5.
- [15] 王仲高. 加紧学生军训与健全军训教官问题[J]. 大路周刊,1939,(19/20):12.
- [17] 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统一时期(152)(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10200-00152-011)[Z].
- [18][19][21][22][24][35][36][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21,4,113,1,14-15,113,21,115.
- [20] 中国高等教育设置现状[N]. 申报,1939-06-10(2).
- [23] 教育部. 教育法令汇编:第三辑[G]. 南京:正中书局,1938:41.

- [25] 蒋介石. 革命的教育[J]. 中央周刊,1938,1(13):3.
- [26] 中央训练团军训教官训练班近讯[J]. 训练通讯, 1939,1(2):215.
- [27][33] 杜心如. 学校军训工作之检讨[J]. 国民教育季刊,1942,(6):9,9.
- [28] 中央训练委员会训练团三年调训计划摘要[J]. 训练通讯,1939,1(3):66-67.
- [30] 中央法规训练总监部所属各级国民军训人员给假规则[J]. 云南省政府公报,1938,9(65):3.
- [31] 杨芳毓. 在军训会报告——全国军训会议经过[J]. 四川省政府公报,1938,(115):71.
- [32] 选调高中以上学校军训教官助教入学暂行办法[J]. 国民教育季刊,1942,(6):80.
- [34] 教育部训令第47970号[J]. 教育部公报,1942,14(21/22):32.
- [38]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二十八年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实施方案草案(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藏)[Z]. 1939:3.
- [39]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 中国国民党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三)[G]. 1985:199.
- [40] 训练总监部. 训练总监部民国十八年工作报告书(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藏)[Z].
- [42] 二十九年学校军训工作实施纲要[J]. 政治半月刊,1940,(2):42.
- [43] 上官业佑. 建立精神国防与战时教育方针[J]. 明耻, 1942,7(10/11):1-2.
- [44] 郭保林. 纵横天岸马——傅斯年[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135.
- [45][49][52] “教育部”军训处. 学生军训五十年[M]. 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3,3,72.
- [46] 杨德生. 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359.
- [47] 左和金. 大后方文化区散忆[J]. 红岩春秋,1998,(1):39.
- [48] 管贻谋. 大学军训在柏溪[J]. 中国青年,1940,(6):98.
- [50] 方秋苇. 抗战时期的兵役法与兵役署[J]. 民国档案, 1996,(1):128.
- [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5)[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29.
- [54] 岳. 学生从军[J]. 中山月刊,1944,5(1):9.
- [55] “国防部”史政局. 中日战争史略(上)[M]. 台北:正中书局,1968:136.
- [56] 怀丹. 关于学生从军[J]. 新青年,1944,9(2):2.

(本文责任编辑 曾伟)